

清代红学史

盛世闲人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清代红学史

QINGDAI
HONGXUE SHI

盛世闲人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红学史 / 盛世闲人著. — 贵阳 :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456-0942-4

I. ①清… II. ①盛… III. ①《红楼梦》研究—文学史—中国—清代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0002 号

清代红学史

盛世闲人 著

责任编辑 程冠华 刘娟娟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公寓 A 座

(电话:0851-82263049 邮编:550081)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字数 13.5 印张 18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6-0942-4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化家大坑 电话:010-59603199 邮编:100071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001
第一节 红学兴起的因由 ·····	003
第二节 红学与红学史的研究范围 ·····	007
第三节 红学史的分期问题 ·····	012
——兼驳所谓“新红学”	
第四节 枉入若许年的“红尘”世界 ·····	023
——兼驳所谓“市民阶层”	
第二章 探原求真的坦途：评论·····	035
第一节 评点作品概述 ·····	037
第二节 评点与文本同时诞生？ ·····	045
第三节 第一批言《红》诗 ·····	058
第四节 脂本三《序》中的评论 ·····	066
第五节 主旨论 ·····	069
第六节 人物论 ·····	087
第七节 结构论 ·····	108
第八节 “小说革命”声浪中的评《红》言论 ·····	118
第九节 别开生面的《红楼梦评论》 ·····	121

第三章 推波助澜汇洪流：传播	125
第一节 传播盛况	127
第二节 为何一书五名?	131
——传播中的疑问之一	
第三节 作者是谁?	136
——传播中的疑问之二	
第四节 手抄本扫描	144
第五节 一桩公案：后四十回是程高“补”，还是“补作”？	154
第六节 咏《红》诗词如潮	160
——《红楼梦》影响之一	
第七节 续貂者未必都是狗尾	168
——《红楼梦》影响之二	
第八节 文艺形式的大转换	179
——《红楼梦》影响之三	
第九节 飞越重洋 走向世界	188
——《红楼梦》影响之四	
第十节 查禁闹剧	191
第四章 胡同里的折腾：索隐	195
第一节 索《红楼梦》之隐的来由	197
第二节 大观园在何处?	202
——从《随园诗话》两次改版说开去	
第三节 引发后代的索隐热	204
后 记	21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红学兴起的因由

小说《红楼梦》研究，被称为“红学”。以一书名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

“红学”一词，出现于清末。有个叫雷瑯的人，号均耀，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写了一篇“红学诞生记”。

华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读小说。自言平生所见说部有八百余种，而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精理名言，所谭极有心得。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或问：“先生现治何经？”先生曰：“吾之经学，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谓。先生曰：“无他。吾所专攻者，盖红学也。”^[1]

“經”字少三曲，便是“红”。朱子美本是用拆字法说了句俏皮话（北方人称“噱头”），有人却认真了，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

不过，红学的兴起，确是深有原因的。

清人得天下后，为巩固其统治，大兴文字狱。文人避席不敢多说，

[1] 均耀：《慈竹居零墨》。转引自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以下简称《红楼梦卷》），第41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十八册有类似的记载。

乃钻入文物训诂的故纸堆中去，汉学于是成为乾、嘉之际的昌盛之学。但汉学的订诂琐碎，逐渐为士人厌弃。清初，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的义理之学，两部《圣训》，便是义理之学的翻版。士人们为通过科举考试而得官升官，都把义理之学当作入仕的敲门砖。正如均耀所说：“时风尚好讲经学，为欺饰世俗计。”徐珂记载道：“乾、嘉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讥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2]义理之学既已“欺饰世俗”，“穿凿附会，曲学阿世”，加上它本身的空疏不切实用，理所当然地被逐渐厌弃。于是，部分有识之士转而注重明末清初三大儒提倡的“实学”，关心水利建设，进而漕政、赈政等户政，如湖南人陶澍、贺长龄在江淮实行的改革便是。其后，这部分注重实学的士人进而大办洋务，如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等。另一部分士人则于汉学、宋学等古文经学之外，另辟蹊径，倡治今文经学，欲利用今文《公羊》学的“三统”“三世”说，实行变革。然而今文经早已亡佚，他们从其他典籍中搜寻今文经的“微言大义”，不免有过多武断之辞。特别是倡导今文经学的康有为参与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今文经学也就逐渐走向末落，“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3]。故清中叶以后，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今文经学，都渐趋式微。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加快了经学式微的步伐。人们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一部分先进的士人放眼世界，如魏源有《海国图志》出版。另一部分士人则把自己的志趣取向、治学取向转到小说、戏曲等方面。如上述朱子美，是光绪十六年（1890）恩贡的举人，候选直隶州通判。著有《一乐居士文稿》、《屯窝诗稿》、《梦昙庵词稿》、《词媛姓氏录》等。他就是把志趣和治学转向小说的一个例证。“自言生平所见说部有八百余部”，虽很难说他都仔细阅读过，但亦足以说明他的志趣所在。经学的式微，是红学勃然

[2] 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

[3] 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注，载孙雄著《道咸同光四朝史诗一斑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油印本，下册。今见一粟编《红楼梦卷》第404页。



兴起的原因之一。

在儒家经学式微的情况下，梁启超为了实现政治改良的目的，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4]虽然，这种把小说的功效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不符合实际的，但，他的说法显然是与视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尖锐对立的。使人甚至认为：“吾国之小说，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德小说。”^[5]这种赞誉也名不副实，却对《红楼梦》的传播与推动《红楼梦》研究起着舆论作用。

另一原因是时局的动荡不已。从嘉庆末年起，早已潜伏的社会矛盾如地火喷发。连续八九年的白莲教起义已使清廷疲惫不堪，从广西开始的太平天国运动蔓延到十多个省，捻军的铁蹄驰骋于中原大地，天地会的影响几乎无处不有，天理教起义军甚至一度进入紫禁城，自山东兴起的义和团虽一度被皇室利用，但它前期和后期的活动使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当内忧正兴，外国侵略者依靠坚船利炮，又纷至沓来。不但夺利割地，且逼得咸丰皇帝、慈禧太后等皇室成员一会儿“东狩”，逃至避暑山庄，一会儿“西狩”，逃至西安。整个中华大地处于大动荡之中。知识分子历来不是依傍这股政治势力，便是依傍那股政治势力。在大动荡的时局中，知识分子也开始大分化。大批先进的士人，如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黄兴等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或改良、或起义、或革命的号角和旗手。另一批士人，如一些已经入仕的官僚，则死抱着封建僵尸不放，祈求升官进爵。也有一批士人因政治上一时无所适从，

[4]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5] 转引自王运熙等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第5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内心空虚失落，转而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乐园。当然，有部分士人接触文学艺术，是出于爱好，另一部分士人则以文学艺术工作为职业。不过，“尤以《红楼梦》最为笃嗜”，大概是共同的。于是，红学乃勃然兴起。

有人好言“语境”二字。对清代的人文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上述梗介，便是谈论红学诞生的“语境”。



第二节 红学与红学史的研究范围

朱子美说自己不治经学，而治比经学少三曲〔《》〕的红学，本是用拆字法开玩笑，说了句“俏皮话”。

可是，有人却因此硬把“《红楼梦》研究”称为红学。而且约定俗成，人们已把这个名词沿袭了下来，现在要废止它，恐怕“积重难返”，已不可能了。本书拟记述清代人对《红楼梦》研究的一些情况与业绩，也只得入“乡”随俗，称之为《清代红学史》了。

朱子美的玩笑，开得可大啦。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以儒学为核心。研读《论语》《孟子》的人，成千成万，研究著作亦汗牛充栋。可研究那位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丘的书，并未称为“论学”；研究被誉为“亚圣”的孟子的书，也未称为“孟学”。至于与《红楼梦》齐名比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的研究，虽早于《红楼梦》研究，也未称为“三学”“水学”“西学”。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领域，《红楼梦》可翘首而言曰：“唯我独尊！”

朱子美的玩笑，开得可大啦。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梁启超辈、王国维辈，都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发表。陈独秀、汪精卫等等在政治风浪中摸爬滚打的正反人物，也都有关于红学的文章发表。连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多次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大谈《红楼梦》。这些，不仅因为《红楼梦》的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吸引着读者们，只怕

也与红学的偌大名声有关。

既然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便得遵循学科建立的四大原则，即确定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

红学的研究对象，是《红楼梦》，即《红楼梦》文本，就这么简单。可最简单的准则，有人就是不遵循。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洋洋洒洒，堪称“大著”，却言不及《红》。此非危言耸听，具体例证不少。

红学研究的宗旨，当是深掘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读懂、读通、读透《红楼梦》。舍此无他。

为着这个宗旨，必须进行背景研究。即《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和社会，以及《红楼梦》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和社会。

也是为着这个宗旨，必须进行作者研究。研究作者的生平经历与《红楼梦》的产生有何关联、对《红楼梦》中的思想倾向有何影响，作者的创作思想是什么，等等。

《红楼梦》自手抄本流传开始，到木活字的摆字本，到雕刻本，再到石印本、铅印本，版本众多。也是为着读懂、读通、读透的研究宗旨，必须进行版本传播情况的研究，艰苦而细致地比较多种版本在文字上的异同与优劣。例如，“冷月葬诗魂”，戚序本作“冷月葬花魂”，虽只一字之差，却大异其趣。这便是显示版本研究的价值之一例。

总之，《红楼梦》的文本研究，是红学的栋梁，是红学的康庄大道。背景研究、作者研究、版本研究，都是为文本研究服务的。

文本研究、背景研究、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是红学的四大内容、四大支柱。这叫“众星拱月”。“月”，就是文本。如果注意力不及乎“月”，“众星”不管如何耀眼，天空总不如有月时灿烂。既有“明月”，又有“众星”，才是红学的绝妙大观。

红学，本是句玩笑话，可是，有人还在大谈红学的什么分支：曹学、脂学、探佚学，还有什么秦学。这岂不是在玩笑话中又开玩笑？

红学的“红”字，何谓也？《红楼梦》也。围绕着“读懂、读通、



读透”这个总目的而进行的《红楼梦》研究，便是最正宗、最有用的红学。可是，有人竟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物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1]离开《红楼梦》，还有什么红学呢？真是“满纸荒唐言”！一个《红楼梦》研究者竟说出如此荒唐话，委实令人惊恐难言。

有评论者曾大声问道：“秦学，究竟是何学问？”如果大家都来回答这个问题，经过一场讨论，也许可以解决红学界误用、滥用“学”字的严重问题。可是，有人振臂，却应者寥寥，聋者不闻，哑者无言。于是，“秦学”，还有欲言又羞的“解梦学”，依然堂而皇之地站在书店的书架上。对脂砚斋的评语加以梳理和研究就叫“脂学”，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那么，对王希廉评语、张新之评语等也加以梳理和研究，岂不是又有“王学”“张学”等应运而生？于是，红学便成了这个学、那个学的仓库了。“学”字满天飞，说穿了，无非是乔装精深，揽一个时髦的“学”字，来提高自己的身价。可是，物极必反。“学”多了，反不值几文了。自诩，实自贬也。人们知道，天文学曾以日中心说作为理论根据，恕笔者才疏学浅，不知红学的理论支撑是什么，更不知“秦学”、“解梦学”有何理论做骨架？

依笔者看，什么曹学、脂学、秦学，还是称曹雪芹研究、脂批研究、秦可卿研究为好，既本本分分、朴质地道，又一目了然，不要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不要摆出一副臭架子来。

再说所谓探佚学，无非是根据脂批的几句话，加上大量想象，写成什么《秦可卿之死》、《鸳鸯之死》等等。俗话说：“你不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何以知道《秦可卿之死》等等中的对话和细节，曹雪芹一定会如此写呢？就算孙悟空有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捣鬼”的本领，

[1] 周汝昌：《什么是红学》，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孙悟空也并不知道铁扇公主在想些什么、下一步会采取何种行动。自《红楼梦》面世后，为《红楼梦》写的续书，多达六十余种，挤破了曹家的门框。《秦可卿之死》等等，充其量可算为《红楼梦》的几种新续书。其目的，无非也是去挤一挤曹家的门框，想伴龙得雨，与曹雪芹、逍遥子、秦子忱等搞点“利益均沾”。岂有他哉？虽然读者平心而论，认为续貂者并非都是狗尾，但是灌木永远不能和乔木比高矮。

再如，研究作者的生平是必要的，但是，为曹家祖籍是在河北丰润，还是在辽阳，争得面红耳赤，“几挥老拳”，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又不修《曹氏族谱》！即使修出了一本最真实可靠的完善的《曹氏族谱》，对读懂、读通、读透《红楼梦》，又有多大作用？这样的“红学”，无以名之，名之曰“钻牛角尖红学”可也。

怪事年年有，唯独红学界的怪事特别多、特别怪。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康、雍时代的“市民阶层”说；20世纪末，又出现了曹雪芹与竺香玉夫人共同毒死了雍正皇帝的特大“新闻”，使读者伸出去的舌头长久缩不回来。严肃的史学界历来以求实求真为研究鹄的，恕笔者才疏学浅，从来不相信古代中国曾出现过市民阶层，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史学家考证出雍正帝死于曹雪芹之手的“史实”。这样的“红学独创”，无以名之，只能称之曰“转基因红学”。

红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本研究的历史、时代背景研究的历史、作者研究的历史、版本研究的历史，舍此无他。而“牛角尖红学”与“转基因红学”不在红学史的视线之内。

还要说几句的是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建立学科的重要一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红学研究，普遍使用的是考证法，此外，还有分析归纳法、逻辑推理法、统计法、比较法、阶级分析法等等可以运用。方法必须是科学的。只有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较为科学的结论。有人提出什么分身法、舍身法、隐身法等等，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可统称之为“胡凑法”。我们是“拿来主义者”，连



外国的科学方法也要“拿来”，但“胡凑法”却不可“拿来”，它不在《红楼梦》研究者和红学史研究者的视线之内。请红学界人士多关注《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方法的创新，必会促使红学不断涌现新成果。

二百来年中，在红学这座大观园中，群枝竞发，百花争艳。既有坦荡大道，也有羊肠小道；既有潺潺细流，也有起伏丘壑；既有风和日丽，也有暴风骤雨。坦途得延伸，坎坷待荡平，经验须总结，教训应吸取。宏观细品，将“经验和教训”都纳入囊内，正是治红学史的目的。

红学史，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条重要分支，任重而道远。

第三节 红学史的分期问题

——兼驳所谓“新红学”

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红学史也不例外。只有分期研究，才能开挖出多项研究的时代特色，和研究者的个人特色。

红学史如何分期？这由红学研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也必须考虑时代对红学研究的深刻影响。

郭豫适于 1980 年出版的《红楼研究小史稿》说：“《红楼梦》研究的二百多年的历史，可以用一九二一年‘新红学’的出现作为标志，区分为前期和后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清朝乾隆年间至一九二一年，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二一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至一九五四年，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胡适唯心论以后的时期。”

陈维昭于 2004 年出版的《红学通史》分为四个时期：1754 年至 1901 年；1902 年至 1949 年；1949 年至 1978 年；1978 年以后。

白盾、汪大白于 2007 年出版的《红楼争鸣二百年》分为四个时期：1791 年至 1921 年；1921 年至 1953 年；1953 年至 1979 年；1979 年以后。

比较郭、陈、白等人的三种分期，（一）陈的分期，把脂砚斋、永忠等人的批语与诗作包括在红学之内，这是求实的，而白盾等的分期，以程本问世（1791 年）为起点，认为脂批“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在《红